

农民军失败的原因等,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参考材料。

##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中的时间新证

吕 坚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以下简称《关系文书》)是康熙时清方有关对罗马教皇的官方文书,旧藏于故宫懋勤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这些文书相继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七年(1928年)、十九年(1930年)从故宫大内为人发见,并在民国十九年八月出版的故宫《文献丛编》第六辑冠以《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为名发表,又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全部影印出版。

据《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载,一七〇〇年在华天主教徒已达三十万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皇格勒门(Clementus)十一世因在华传教士及教徒中发生“礼仪问题”,故二次派使臣携禁约来到中国,向清朝政府提出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中祭天、祭祖、祭孔等仪式要求。由于干涉到中国当时的传统信仰和内部事务,理所当然地受到康熙本人的严厉拒绝,并表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sup>①</sup>《关系文书》中辑有康熙对清方呈报与罗马教廷文书所作多处删改圈点及亲笔朱谕等件,共计十四通。《关系文书》反映出康熙本人对西方天主教的态度和看法,是研究清初西方天主教在华活动的重要珍贵史料,向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但是这十四通文书中有九通均属于时间不详,或因原件未具年月,或只具月日而无年份。幸值发表时有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费心钩稽,推订出文书的时间顺序,详由见诸《关系文书影印本》序言,此不作赘述。

《关系文书》中第八通“康熙谕广东巡抚调查费理薄等是否系教王差使”,即是属于未具年月一类。陈垣先生曾考订为康熙五十六年。笔者近因工作之便,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宫中档》中发见两件档案,内容、时间与第八通文书皆有关连,尚可作为该文书的时间新证。

为便于说明这一问题,兹先引述该文书如下:“养心殿、武英殿等处管制造带西洋人事。伊都立、张常住、王道化、赵昌钦奉上谕传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九月十六日到来西洋人费理薄、何济格二人,称系教化王所差,并带来教化王奏帖一件,询其来由,并无回奏当年所差艾若瑟传旨之事,但云教化王

随即差人复命。因无真凭实据，其奏帖皇上亦未开看。费理薄、何济格二人亦不曾着与在京西洋人见面，此二人现留在京等候。此字到日，尔等可即速将此二人来历问明回奏。……”

由上可知，传教士费理薄、何济格二人系罗马教皇所使，(?)年来华后于九月十六日到京。伊都立等所传康熙上谕是要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查明费、何二人来历等情况。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明费、何二人来华时间。对此，《宫中档》中康熙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折恰好可为说明。其折称：“本年七月二十二日西洋人费理伯、何济各二名，赍捧教化王表文前来复命，奴才等业经奏报在案。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填给勘合，会差把总丁喜、百总唐上联伴送来京。”<sup>②</sup>

据此可知，费理薄(伯)、何济格携有罗马教皇表文是在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到达我国广州，七月二十九日离广赴京，折中内容与第八通文书言及情况适相吻合。第八通文书记载费、何二人系九月十六日到京，推算当时京广途中需历时计四十六天。

另外，《宫中档》中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两广总督杨琳折，亦曾载有回奏康熙接到伊都立等传上谕情况。其折云：“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奴才等前差赍摺兵丁回粤，接到养心殿伊都立等传上谕：教化王虽使人至广，着细问缘由，奏明之后方可入京等因。又传上谕：着问到来西洋人费理伯、何济格二人来历，并先年来的德里格、马国贤二人，是否系教化王所差？……查明回奏等因钦此。查，西洋使臣嘉乐于九月十一日抵省……于九月二十七日委员伴送，跟随李秉忠来京讫。”若把从京广之间传旨所费时间除去外，再推算第八通文书的具体发文时间，至迟似不应晚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下旬。因之，陈垣先生原考订为康熙五十六年的说法，显与事实相左，因为费理薄等人尚未来华。<sup>③</sup>

依据上述档案佐证，把这通距今已二百六十年的文书重新考订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当是可信的。另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今后如要再版，第八通文书的时间既已得到确证，其排列顺序应作调整，即移入第十三通文书之前，是较为合理的(因十三通文书正是有关罗马教皇使臣嘉乐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京之后情况)。

注：

①《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十四通“禁约”硃批。故宫博物院编 民

国二十一年三月出版。

②勘合：清朝发给的驰驿文书，沿途凭此供应人夫车马。

③同①上书序言；另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 一九八一年出版。

## 《梁启超传》出版

李 冰

在中国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曾出现过众多的有影响的人物，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个。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识渊博、成绩卓著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及学术成就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梁启超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他一直走着堕落的道路，但作为资产阶级的著名学者，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却大多都是在晚年做出的，他的一生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思想和学术遗产，应当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传》（孟祥才著）是梁启超逝世五十多年来第一部全面研究梁启超的生平、思想和学术的专著，也是关于梁启超的第一部大型传记著作。作者通过生动的文笔，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条件如何造就了梁启超这样的人物，而他的全部活动又给中国近代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反映了梁启超在学术思想上较之他的前辈贡献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怎样限制了他的眼界，从而在他的遗产中使精华和糟粕、珍珠和粪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把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结合于一身的历史人物的一生。

## 一部值得重视的古籍目录 ——《贩书偶记》及其《续编》

王义耀

继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贩书偶记》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